

第一章 九届全国人大：机构 改革方案横空出世

这是一个令全国人民激动的时刻，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时刻：1998年3月10日下午5时45分，人民大会堂内巨大的电子显示屏显示：赞成：2814票；反对：12票；弃权：33票；未按表决器：18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获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

“吃饭财政”、“盖章办公室”、“公款消费”……怎能不令老百姓“怨声载道”？为此，

昨天：

毛泽东：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

邓小平：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今天：

江泽民：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

朱镕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九届全国人大的机构改革方案再次让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公务员大厦将受震动”、“中国建政以来的一场大革命”、“精简机构有助廉洁”，外电不乏云云。

一、春雷乍起

◎ 经久不息的掌声

1998年，3月的北京，春光明媚，暖意融融。全中国人民都在瞩目人民大会堂，整个世界都在聆听北京的声音。

3月10日下午5时45分，人民大会堂内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打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表决结果——赞成：2814票；反对：12票；弃权：33票；未按表决器：18票。

大会执行主席吴阶平宣布：通过。

顿时，掌声潮水般涌动起来，在庄严宏伟的人民大会堂里回荡，经久不息。

机构改革方案通过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反响。

“这次机构改革，既在意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改革确有难度，但不改革不得了！”人大代表、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制局局长杨景宇如是说。

“现在的改革方案很不错，受到大家拥护，也符合当前实际，关键是认真落实，搞好‘三定’。”政协委员、人事部副部长徐颂陶如是说。

“国家财政不能再成‘吃饭财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发展到今天，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如是说。

“我们常年在企业工作，切实感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机构改革势在必行！”人大代表、大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张树平说。

‘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下动上不动，动了更被动’，‘改掉这个单位叫改革，重新设立这个单位叫深化改革’，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被人称为“陈卖光”、“陈送光”的人大代表、山东菏泽地区行署专员陈光大声疾呼。

“这么高的票数通过是意料之中的”。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临时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兴致勃勃地说：“6号那天国务委员罗干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引起不绝的掌声，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长痛不如短痛，希望机构改革的过程能快一点。”四川代表、自贡大西洋集团公司总经理余大全说。

“下海多挣钱，呆在机关里干嘛！”颇具学者风度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则如此风趣。

“前六次机构调整，与这次的机构改革相比，只能说是‘改良’，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孙彤教授对此高度评价。

“前几次机构改革均在改革的初期进行，外部环境尚未完善，市场也没有成熟；而现在市场转型已实现，市场化具备了一定程度，机构改革成功率高。改革不仅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办事效率，对于抑制腐败也有积极作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璐璐教授非常乐观地说。

“对机构改革，我们的态度是‘干好工作，两种准备’，个人去留不宜多想，关键是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知识水平搞上去。即使把我们裁并了，我们有知识、有能力，到哪里干不出成绩？”几位国家部委机关的中青年干部如此表白。

“机构改革宜早不宜迟。作为老百姓我坚决支持国务院机构改

革。国务院改了，地方上也不能拖得太久，一拖下去，各种对策都来了”。“我们热切希望组建一个精干高效的政府，更企盼换届选举产生能够驾驭各种复杂局势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这是广大基层老百姓的肺腑之言。

洛杉矶《国际日报》说：“机构改革任务紧迫 是一条不归路。”

日本《每日新闻》评价：“中国背水一战，推行改革，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

◎ 改革方案问世

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原则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改革的重点是国务院组成部门，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将原有 40 个组成部门精减为 29 个。具体为：

（一 宏观调控部门

1. 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2. 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3.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高层次议事机构，总理兼任主任，有关部长任成员，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

宏观调控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健全宏观调

控体系，完善经济，法律手段，改善宏观调控机制。

（二）专业经济管理部门

1. 保留铁道部、交通部、建设部、农业部、水利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2. 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将原广播电影电视部、航天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的信息和网络管理的政府职能，并入信息产业部。成立国家邮政局，由信息产业部管理。信息产业部的主要职责是：振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通信业和软件业，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信息化；制定本行业的规划、政策和法规；统筹规划国家通信主干网（包括本地和长途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包括无线和有线电视网）、军工部门和其他部门专用通信网，并进行行业管理；合理配置资源、避免重复建设，保证信息安全。

3. 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将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以及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统归新组建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管理。逐步将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企业集团。保留国家航天局和国家原子能机构，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作为国防科工委的机构。国防科工委要与军委有关部门配合，负责军事装备的生产供应，科研规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国防科工委负责制订各类军工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法规，实施行业管理，会同国家经贸委制定军工转民品生产的规划。

4. 将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国内贸易部、轻工总会和纺织总会，分别改组为国家煤炭工业局、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冶金工业局、国家国内贸易局、国家轻工业局和国家纺织工业局，由国家经贸委管理。国家粮食储备局改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将化学工业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政府职能合并，组建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由国家经贸委管理。将林业部改组为国家林业局，列入国务院直属

机构序列。电力行业已组建国家电力公司，不再保留电力工业部，电力工业的政府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国家经贸委及其管理的各国家工业局，负责组织制订行业规划和行业法规，实施行业管理。这些国家局不直接管理企业，所制定的行业规划、行业法规以国家经贸委的名义发布。化工部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化工总公司下属的油气田、炼油、石油化工、化肥、化纤等石油与化工企业以及石油公司和加油站，按照上下游结合的原则，分别组建两个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和若干大型化肥、化工产品公司。国家林业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护林防火，加强林业行业管理，制订林业规划和法规。

（三）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和资源管理部门

1.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科学技术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

2. 在劳动部基础上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行政机构，现由劳动部管理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人事部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民政部管理的农村社会保险、各行业部门统筹的社会保险，以及卫生部门管理的医疗保险，统一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

3. 人事部职能调整为：综合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公务员，承办国务院监管的大型企业领导人员的任免事宜，承办国务院向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稽察特派员的管理工作。

4. 不再保留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体委的职能委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列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5. 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其中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作为国土资源部的部管国家局予以保留。国土资源部的主要职能是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

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电视网络政府管理职能划出后，改组为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

（四）国家政务部门

保留外交部、国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民政部、监察部和审计署。

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序列和组成见图 1—1。

为适应改革的要求，对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分为四种情况：保留一部分必需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

将国务院部、委调整为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为适应需要组建新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将有关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并入有关部门，作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调整后，国务院直属机构设 15 个，办事机构设 6 个。

由于既要考虑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当前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方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将会进一步改革政府机构，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 迈出沉重的第一步

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后，地方各级政府也将进行机构改革。机关干部编制总数将减少一半，国务院机构减编定员的工作在 1998 年年底以前完成，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做好人员分流的工作。人员分流的基本办法是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前劳动部长李伯勇说得更清楚：未来 3 年内各级官员至少 400 万人“下岗”，“下岗”的原则是“无情调节、有情安排”。万里长征迈出的仅仅是第一步，改革后的政府职能是否转变，工作作风是否改进，办事效率是否提高，是衡量和判断机构改革是否获得成效的重要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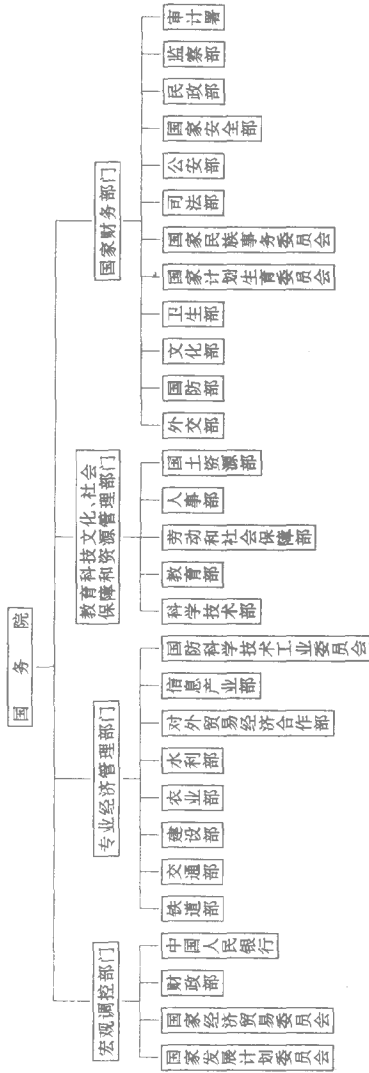


图 1—1 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序列和组成图

二、方案出台的前前后后

◎ 吃饭财政

据财政部有关资料统计，截至 1996 年底，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已达 3 673 万人，比 1978 年增长 82.3% 大大高于我国同期人口增长 27.1% 的幅度。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2.1% 上升到 1996 年的 3%。也就是说，1978 年一个“吃皇粮”的大约由 50 个人来供养，到 1996 年则只有约 30 个人来供养了。一支多么庞大的“吃皇粮”队伍！这支壮观的队伍中，党政机关干部超过 800 万人！

有人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供养关系比例）作了大致的比较：汉朝时期是 7 943 人养一个吃皇粮的，约为 8 000 : 1 清朝时期是 910 人养一个吃皇粮的，约为 1 000 : 1 解放初约为 600 : 1 现在则约为 30 : 1。1993 年进行的机构改革，虽然对机构和人员编制作了一定比例的压缩，但财政供养人员却未能相应减下来，在某些方面反而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趋势。据统计，1993 年机构改革之后到现在，又增编 100 多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膨胀，令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苦不堪言。

当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头费”开支庞大。1997 年两会期间 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诉苦，令他最头疼的三件事是：人、车、会。人、

车、会的具体含意是：人：“吃皇粮”者；车：公务用车；会：各种大会小会。这三项是财政支出的大头，而“人头费”又高居第一。

分析近 20 年财政支出的结构，不难看出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被“人头费”吃掉了。若按现行平均每人每年一万元个人经费标准计算，1996 年 3 673 万财政供养人员就需要财政供给经费 3 600 多亿元，人头费几乎占国家总财力规模近 8 000 亿的一半。此外，对每个“吃皇粮”者，还需相应提供办公设施、个人住房、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若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每增加一个“官”，一年至少需要增加财政支出 2 万元以上，由此增加的财政负担就更为沉重。

当前，国家财力增长的大头不得不用来满足“吃饭”和“养人”。从 1993 年到 1997 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加 1 000 亿元。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员每年增加 100 多万人，加上工资制度改革等因素，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就达 600 多亿元，占国家新增财力的 60% 以上。在许多地方，80% 以上的新增财政收入用于人员经费。有人戏称我国现在的国家财政为“吃饭型财政”，而在有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财政连“吃饭”都保证不了，往往需要四处借钱才能解决“官员们”的“饭钱”。1992 年，全国 2 181 个县中，有 1 091 个县出现财政赤字。

第二个显著的特点是行政管理费增长太快。机构庞大，不仅要增加人头费开支，而且要相应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权威资料表明，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已由 1980 年的 66.79 亿元增长为 1996 年的 1 040.80 亿元，增长了 14.5 倍，而同期的财政总支出只增长了 5.46 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80 年约为 5%，到 1995 年则上升为 12% 左右，1996 年进一步增加到 13.1%，是各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

近年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三乱”现象屡禁不止、甚

至愈禁愈烈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太多、“吃皇粮者”太多，财政养不起。“堤内不足堤外补”，财政养不起，只好搞“三乱”创收，设立小金库，搞预算外资金，违反财经纪律。据财政部有关资料，1995年，全国预算外资金收入就达3843亿元，超过正常财政供给经费达几百亿元之多！1997年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查出违纪金额200多亿元，据知情者透露，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种检查，一般是请检查单位吃一点、被查单位交一点、违纪金额大头留下来，检查和被检查单位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相安无事。1996年、1997年，国家计委、财政部会同有关部委，取消了大量乱收费项目，即使如此，仍然有28项大宗的、主要的收费、基金项目未纳入预算管理。这28项收费、基金项目1996年总收入达525亿多元。

在现阶段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收费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必要性，但预算的资金数字如此之巨，增长如此之快，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分配秩序，侵蚀了税基，而且助长了腐败行为的发生。据报道，福建厦门一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底层干活的老百姓太苦了。农民买个车在路上跑，管、卡、要的都来了，只得停开。许多个体户因为受不了层层“揩油”，只好关门。北京一位私营企业老板则反映，让私营企业最无奈、最影响发展积极性的是政府执法部门滥用职权，先卡后拿再唱OK。巧立名目的乱收费让人应接不暇，无法抵挡，工商要求换章、换印件，税务要求换登记证，银行则要求换支票式样，每一项少则三五十，多则三五百。钱虽不多，但架不住次数多。税务登记证甚至半年内就换了两次，不得不参加的各部门轮流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半年花费就上万。尤其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一些部门动不动就来查企业帐目、用工等情况，挑出点小毛病张口就罚数万元。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目的是将企业的打点费装入部门、个人的腰包。

◎“盖章办公室”

前不久报载，南京中央大厦工程，所盖公章已突破 1 000 个，但是要竣工试营业，起码还得盖 100 个公章。贵州一家单位的情况更糟，为了申请一个项目，光打报告用的材料就要用两个大麻袋来装，为了盖齐项目所需要的几千个“戳”，特地成立了 8 个人的“盖章办公室”，专门从事申请盖章业务。一个章代表一个机构、一个“衙门”，机构臃肿，职能交叉，部门重叠，程序烦琐，该管的没人管，不该管的争着管，办事效率怎么能高得起来？

中国政府机构的设置通常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高山仰止的巍巍“金字塔”式结构，一个是惊人般雷同的“同构性”。

第一个特点是由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的内在联系形成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机构的组建模式概莫能外。问题是中国的这座“金字塔”重复设置的机构太多，使得“不管事”的官员太多。官员兼职多、闲职多、副职多的“三多”现象是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式官僚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

新中国成立之初，除中央政府外，全国有 50 个省级行政区，一般设置委、厅、局、部 16 个左右，1952 年增至 25 个，1953 年增至 30 个，1957 年增至 45 个；“文化大革命”前夕增至 60 个。国家曾为此规定，省级行政区的党政机构一般为 35—40 个，小的省、自治区应少于 35 个。但 1988 年，省级行政区平均拥有的机构多达 57—85 个，1990 年上升为 70 多个，个别省多达 100 个。1993 年国务院工作部门有 86 个，省级党政机构平均 70 多个，地区一级党政机构平均 50 多个，县级平均为 45 个。1982—1992 年 10 年间，中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机构改革，省级各机构也被迫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但每精减一次，不久又以各种理由改头换面迅速恢复和膨胀起来，造成大“庙”小“庙”林立。

“庙多罗汉多”。据有关统计，省一级机关在 1989—1990 年期间就增长处级以上干部 2 000 人，有的省级机关厅处级干部占全部干部的 40% 左右，有些县的乡镇干部中，副乡长竟占到 65%，县直机关副乡级以上干部占到 56%。某省一次开会，一位副省长竟被排到 108 位。在不少机关中，官兵各半或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已是人们见怪不怪的事实了。

50 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帕金森针对英国行政机构充满矛盾、扯皮、办事拖拉等“官场病”，提出了著名的“帕金森定律”： $X = \frac{2KM+I}{N}$ 。式中 X 为行政部门每年增加的职员人数，K 表示一个要求增派助手从而达到提升目的的人，I 为 K 从被任命到退休期间的年数，M 是部门互相扯皮而耗费的劳动时间，N 是被管理的单位数。帕金森教授用这个简洁的公式揭示了英国政府机构用人越来越多的秘密：当官者宁可找两个比自己水平低的助手，也不愿找一个能力和自己差不多的下属。这样，机构会变得越多越大，扯皮也就越多，人员增加也就越快，形成恶性循环。帕金森教授考察的只是英国一隅，但“帕金森定律”恐怕放之四海而皆准，万里之外的中国也适用。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和尚没水吃事故和“帕金森定律”尽管“国情”不同，但实质却是一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个特点是机构设置的“同构性”。中央政府设置了分工很细的若干专业部、委、局、办机构。这些职能机构要行使权力，必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设置相应的对口机构，这样一来，不仅地方各级政府与中央政府各种机构的设置大同小异（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小国务院”），并且很多企、事业单位为了工作需要也照此设置部门，和政府“接轨”，以求对口。

至今，除台湾省外，全国共有 31 个省级行政区，337 个地级

和 2 183 个县级行政区，56 000 多个乡镇，从上至下，级级设有政协、人大、政府、群团等不同系统的若干工作机构班子。这各级“同构性”的班子里汇聚了上千万“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全国人大是一家”、“全国政协是一家”、“全国××是一家”之类的调子不绝于耳，既透着“自己圈子”里的亲热，同时也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只要在中国地盘之内，不管是长城内外还是大江南北，无论你是人大的，还是政协的，只要你是“公家人”，都可以找到“自家人”，也就可以管吃管喝管卡拉 OK。因为既是自家人，就免不了“走动走动”。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次招待人家，下次人家招待，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中国机构设置的“同构性”：历史的沿袭，即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设立中央、地方政权的做法；以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权建设模式为蓝本形成的。这种等级分明的同一垂直系统模式对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基本适应的，也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建立，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等都只能起到阻滞作用。

西方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国家，政府部门和行政层次要精简得多。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领土面积 90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2 亿多，和中国相比，除了人少点，也算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了。据世界银行统计，1997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达近 7 万亿美元（69 900 亿美元）是中国约 7 000 亿美元（6 910 亿美元）的 10 倍。但美国联邦政府只设 13 个部，66 个独立行政机构。拿部来说，不及中国 1997 年 40 个部的 1/3。

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97 年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 7/10 强，达 4.6 万亿美元，是中国的近 7 倍，人口也不少，有 1 亿多，把日本列岛挤满了，按理说事儿应不少，可日本中央政府

设的部更少，只有 12 个。

法国、德国、英国这些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可能要官僚些，但法国和德国中央政府也只有 17 个部，英国只有 16 个部。并且，许多国家只设正职，没有副部长，副厅长或副局长，开个内阁会议摆张小圆桌就行了。地方政府部门数量也不多。一个几千上万人的小城镇，跟中国的乡镇差不多吧，但公务人员一般也就三五个，一个人常常身兼数任：既当警察，又当市政官员，甚至还要当验尸官。

这些国家政、企严格分开，一般不设经济专业管理部门，也不因工作性质不同而单独分设专门机构。如日本的通产省（相当于我们的部）负责管理国内外贸易、工业和商业，承担资源和能源供应管理，负责有关工矿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等十多项职能，顶得上我国十几个部。

◎ 公款消费是“无底洞”

公款消费浪费惊人，是现有机构体制另一“杰作”。

“自己工资基本不花，自家的饭基本不吃”，这是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中的两句，描绘的是某些党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用公款吃喝度日的形象。尽管形容有些夸张，但从中可略窥一斑。

据资料显示，1989 年全国公款吃喝开支达 370 亿元，1990 年达到 400 亿元，1992 年超过 800 亿元，1994 年突破 1000 亿元大关。近几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全国大中型饭店、宾馆 60%—70% 的收入来自公款吃喝。有人曾做过计算，如果把全国一年喝掉的酒倒在一起，可以装满整整一个杭州西湖，其中大半是公款喝掉的！

在这些大吃大喝中，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跑的除了汽车、水里游的除了军舰，什么都敢吃，什么都吃！

鸡鸭肉鱼早已过时了，乌龟王八也已经没有胃口，吃就要吃国家明令保护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据农业部反映：为吃熊掌，已使东北黑熊数量锐减；为品香獐，已使西北此物绝迹。现在一些珍贵保护动物濒临绝迹，山珍海味价格暴涨。尽管如此，捕猎依旧，买卖依旧，吃喝者照吃不误。对此，连一掷千金的海外富商都自愧不如。

一些干部由于频繁吃喝酗酒，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坚持正常工作，不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有些干部下基层，也只是走马观花，大吃大喝一顿，即大功告成“班师回朝”。有些干部“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批准允许”，在吃喝过后，把原则、规章、制度抛到九霄云外，做出误国害民的事来。前些年，云南某地区银行系统干部下县检查工作，领导酒兴大发，结果把陪酒的工作人员活活给喝死了一个。河南郑州一个公安局的前副局长酒后驾车把一家父子俩撞个一死一伤，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演了疯狂而丑陋的一出戏。

如果说公款吃喝是个无底洞，那么公车消费则更令人心痛不已。

1994 年上半年，东北某省购小汽车 4 313 台，支出金额 6 亿多元，相当于全省财政收入的 1/10。

西北某市一个机关，为了买一部进口高级小轿车，竟把一辆完好无损的北京 212 吉普车作报废处理，只卖了 50 元。

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县几百名教师半年没有领到工资，理由是“县财政实在困难，暂时无力支付”，但是，县机关先后却买进了 8 辆高级轿车，县里主要领导全部“鸟枪换炮”，实现“座骑”现代化。

四川某县一公路段，两位主要领导因争坐段里唯一的一辆高级小轿车而矛盾重重，后来段长干脆花巨资买了一辆更高级的供自己享用。

在南方沿海地区的市县府门前，停放的几乎全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首脑和部长们才有资格坐的“奔驰”、“皇冠”等高级轿车。就连单位的交通车，也都是 17 座、20 座进口的全封闭的空调面包车。按价值折算，每一位“乘客”人均享用“投资”达 1.5 万至 2 万元，大大超过国有企业人均固定资产装备水平。

来中国的外国官员、客商和旅游者，对中国城市满街跑的豪华进口汽车之多大感惊奇，以为自己下错了飞机，到了巴黎或纽约。

一位外商在他承包的中国工地上，看到前来视察的普通官员一个个从“奔驰”、“宝马”轿车里钻出来，不禁大发感慨：“参加欧共体财长会议的许多官员也不过坐坐奥迪，中国真不可思议！”

他们不敢相信：在坑洼不平、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的，竟是美国福特和克莱斯勒公司的新产品。滚滚车流中，皇冠、凌志、宝马、奔驰、劳斯莱斯比比皆是。西方身份和地位象征的奔驰，从一般的到最新式最高级的一应俱全，远远超过经济已相当发达的韩国和马来西亚等新兴工业国家。

国际汽车商看到中国公车市场如此之大，禁不住欣喜若狂。于是，各大汽车厂商纷纷来到中国，欲打开中国轿车市场的缺口，在这块世界上最庞大的市场上分一块“肥肉”。

对于单位和领导干部配车，国务院早就规定：正部级以上才能配备专车，副部级只能保证用车，局级要有 3 人才能配一辆车，地方则实行分级管理，县以下必须是科局级单位才能配小汽车。对于公车档次，国务院也作了明文规定：部级坐奥迪，局级坐桑塔纳，依此类推，县处级能坐上“标致”、“切诺基”就不错了。

可是，许多干部并未被国家严厉的控购手续所难倒，竞相攀比，越级购车，越坐越高级，不少处级单位甚至拥有总统级的世界名车。报载湖南某市一专业银行拥有一辆最新奔驰 600 这种车即使在西方都市也不多见，从购车到办理落户手续，共花费人民